

封建贵族地主的典型

——
孔府研究

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

——孔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何龄修 刘重日 郭松义 著
胡一雅 钟遵先 张兆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

——孔府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八九九二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 印张 2 插页 42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7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45 定价: 1.90元

前 言

本书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这项研究开始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事情的缘起还应该追溯得更早。一九五七年，我所部分同志到曲阜参观，初步接触孔府档案，了解到这一片肥沃的处女地。一九六一年，我所现任清史研究室主任（当时任封建后期史研究组组长）杨向奎同志，作为拓荒者到曲阜，对孔府档案进行了几个月研究。其后，他除将研究成果写进他的专著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贵族地主研究小结。向奎同志的研究开扩了我们的眼界。所以当他告诉我们，组织上决定由他带领我们去曲阜抄录一批材料、并集体写作一本《孔府研究》的时候，我们都满怀深山探宝的喜悦，承担了这一项重要任务。

一九六三年七月盛暑，骄阳似火，我们到达曲阜孔府。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热情关怀下，在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积极支持下，立刻紧张地投入选材、校点、逐件拟题等工作。我们选材的范围，依据我所业务性质，明代档案全抄，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档案重点选抄，鸦片战争以后的适当选抄，民国档不要。抄录总数共四千三百五十三件。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社会调查，在孔府和曲阜县城西大庄多次召开座谈会，向原孔府工作人员、原孔府佃户和农村干部请教，实地验看孔府斗秤。这样一直工作到十一月。回所后继续完成校点、拟题和分类工作，并分工做了研究。

11001 / 506

一九六四年夏初，我们就投入了《孔府研究》的写作。每完成一节，向奎同志给我们进行修改，或提出具体的意见。向奎同志强调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强调结合其他文献把孔府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进行解剖，指示我们与欧洲的封建贵族进行比较研究，以概括出孔府作为中国封建贵族大地主的特点。这些指导意见，我们有的努力尝试着去做，有的实在因为知识不够而没有做到。如果这份稿子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跟这些具体指导分不开的。

初稿完成后，还刚进行打印、讨论、修改，我们就连续参加四清去了。接着是文化大革命。这项工作就被束之高阁，连打印稿也散失了不少。

但是，我们最重大的损失，还是我们的合作者张兆麟同志因在十年浩劫中遭到种种打击和折磨，精神和身体深受创伤，于一九七二年不幸逝世。兆麟同志是一位共产党员，是我们六人中唯一的女同志。她为人朴素、诚恳、热情，能团结群众。她对研究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肯动脑筋。在全书中她分工写宗族一章。现在，当我们因修改工作需要而展读她的原稿时，看到她字斟句酌，有时连一个标点错了也不放过的种种痕迹，都不禁黯然神伤，想见她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而每当聚会讨论问题，再见不到她在座，再听不到她爽朗地发言的时候，我们就深感永远失去我们最亲密的合作者的悲痛。

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们觉得，使我们的《孔府研究》重新上马，此其时矣。我们这本书虽然写得并不理想，但是这项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孔府档案使我们有可能就一家贵族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族等各方面作

为典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可能在关于历代封建贵族的研究中是唯一的。这一研究做好了，将有助于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许多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把我们不成熟的稿子加以修改，发表出来，如果能引起史学界的兴趣，推动真正具有高水平的同志来从事这项研究，那是我们最希望的。此外，我们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顽强的想法。兆麟同志曾是深刻理解孔府研究的意义的，她生前从事的一项比较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是《孔府研究》。因此，把稿子尽快改出来，使我们的成果能以完整的形式献给读者，是完全符合她的遗愿的；而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让兆麟同志辛勤的劳动成果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是对她的最好的悼念。

怀着这样一些想法，我们从一九七七年冬天开始进行修改。事隔十三年，我们不得不花很长时间重新熟悉材料，唤醒那些已经沉睡了的记忆。同时，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这次修改比草创花费了多得多的时间。现在总算完成了，了却我们的一桩心愿。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初稿分工的情况：

引言，第三章第二、四节，第五章——何龄修；

第一章，第三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二节——郭松义；

第二章（第四节除外），第三章第一、三节——刘重日；

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一节——胡一雅；

第七章——张兆麟；

第八章——钟遵先。

这次修改工作，除集体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有些章节由起草人自己修改一遍外，还做了相互修改。第一章第一、二、四、五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二节

由刘重日修改；第三章，第八章第一节由郭松义修改；第二章由胡一雅修改。全书有许多繁琐的复核材料、补注、以及将引用的经典著作旧译文换成新译文的工作，是郭松义完成的。附录《明清两代衍圣公世系表》，是供检索用的，由何龄修、郭松义合制。最后全书由何龄修修改一遍后，交向奎同志审阅、定稿。按理说本书应署向奎同志主编，但他坚持认为全稿没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由他亲自起草，他不署主编。向奎同志的想法我们是熟悉的，十六年前这项工作刚开始时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样，我们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本书研究和起草过程中，我们曾请我所现任明史研究室主任王毓铨同志给我们讲《明代王府庄田》，现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孙毓棠同志给我们讲《欧洲庄园经济》，得到他们的热情指导。我们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特别要感谢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 and 同志们，他们对我们的抄录材料、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工作，提供了一切方便，解答了我们一些有关孔府的疑难问题。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是我们在孔府工作阶段的合作者，在选材、校点、拟题工作中，历史系几位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共邹县县委和邹县文物管理所热情地接待我们，派专人给我们介绍孟庙和孟府文物、碑刻、档案，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我所古文字古典文献研究室、图书室、打字室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修改工作虽已完成，但是我们心里并不踏实。全书还存在一些重要的缺点，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不够，个别重要的结论缺乏坚实的论证，把孔府作为一个贵族大地主的典型突出得不够，对孔府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一面揭露较多，而对它伪

善和欺骗性的一面揭露和分析就很不充分，全书在整体结构方面也有缺陷，当然还会有理论上和史实上的错误。但是，目前我们手头都有许多其他的任务要去完成，没有再加工的时间，只得暂时告一段落。集体研究是一种好的方法，它能够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作为一种方法，它是我们科学事业的方向。但是，集体工作是以个人的踏实钻研作为基础的。在集体工作中，应该志同道合，一定要提倡少一些私心，多一些责任心。本书的缺点，至少反映了我们在个人钻研方面的缺点。我们写出来，作为在新长征路上对自己的勉励。

最后，我们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孔氏贵族大地主的形成和贵族地主政权	5
第一节 孔氏世袭贵族大地主的形成	5
第二节 孔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19
第三节 免差特权和争夺执役人手的斗争	31
第四节 统治机构	62
第五节 保甲组织	78
第二章 田产	92
第一节 祭、学田的来源和数额	92
第二节 祭、学田的性质	111
第三节 自置田产	129
第四节 田产的变化和影响	151
第五节 田产的经营形式	166
第三章 地租剥削	183
第一节 地租剥削概况	183
第二节 地租剥削量和地租剥削率	201
第三节 牛租及其它	231
第四节 额外盘剥种种	249
第五节 地租剥削的特点	266
第四章 各种人户	281
第一节 各种人户及其阶级分野	281

第二节	佃户·····	299
第三节	庙户和礼生、乐舞生·····	313
第四节	船户、仆役和匠役·····	324
第五节	各种人户对孔府的人身依附关系·····	334
第五章	商业、高利贷和屯、义集行税剥削·····	350
第一节	商业和高利贷剥削·····	350
第二节	屯、义集及其管理·····	371
第三节	屯、义集上的贸易和行税剥削·····	388
第四节	争夺集税的斗争·····	413
第六章	寄生性消费和农业再生产·····	427
第一节	寄生性消费·····	427
第二节	农业再生产的停滞·····	451
第七章	孔氏宗族和族权统治·····	475
第一节	宗族组织·····	475
第二节	族权统治·····	488
第三节	宗族是孔府和孔氏上层奴役族外人民的工具·····	519
第四节	“圣贤”后裔与宗主衍圣公·····	528
第八章	庙、佃户的反抗斗争·····	541
第一节	抗租抗差斗争的形式·····	541
第二节	抗租抗差斗争的性质和作用·····	557
第三节	农民起义对孔府的沉重打击·····	571
附 录		
	明清两代衍圣公世系表·····	595
跋		
	——兼论明代的“衍圣公”府····· 杨向奎	598

引 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明、清封建世袭贵族地主的一个典型——山东曲阜衍圣公府，通称孔府。

孔府的主人是孔子后裔，从理论上讲应是他的嫡派后裔。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他们“恩渥备加”，“代增隆重”。从汉朝开始，他们就受封为世袭贵族，从封君直到封公侯，绵延不绝。自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这个封号差不多相沿未改，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保持了八百多年。所以，衍圣公府的存在，算得上是源远流长的。作为一个世袭贵族地主，它因此而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典型性。然而，这同一事实还说明，它 also 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风暴所摇撼，不随王朝的更替而沉浮。不管中央王朝发生了什么更迭和变化，不管姓什么的或出身什么民族的做了皇帝，孔府却始终岿然不动，世代相承了下来。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世袭贵族地主中也是非常独特的。因此，孔府的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固然以封建经济制度为基础，但是没有另一个思想、政治条件，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孔府的祖先孔子创立的一套学说，完全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要求，任何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要统治中国这块地方，都离不开它。换句话说，孔夫子的思想灵光，是孔府的护法；孔府的存在，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只有在这种条件

下，孔府的主人才能扛着“同天并老”、“与国咸休”的牌子^①，在历史长河中，在汹涌的政治激流中，安然地游到它的归宿地。

封建朝廷除了赐给衍圣公以爵位的殊荣以外，并拨赐田产和入户，历代相沿，“期于优渥”，帮助孔府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巩固。孔府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稳定性，特别是土地占有权的稳定性，势必对它统治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发生影响，使其种种具体形式更容易以传统习惯方式保存下来。虽然，在孔府统治下，生产方式也要随着社会上的发展而多少有些变化，但却更加缓慢，停滞性表现更加显著。同时，孔府是存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它的大地产业经营，它的封建统治，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孔府的典型对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对封建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法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府政治地位的稳定性，使得它同那些只能与某一个封建王朝相终始，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就消逝了的贵族地主不一样，产生了一个在当时也许并不那么重要的结果，就是孔府大量的私家档案被保存了下来。现存的孔府档案约九千多卷，以清代档案为主，明以前的档案已经没有了，明代档案较少，并且限于明后期，民国档案也不多。这样大量内容丰富而具体的私家档案，是研究孔府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中国封建贵族地主的第一手私家档案，孔府档案是独一无二的。

同历代一样，明、清两代也有因亲、因功受封的两类贵

① 孔府正门柱子上挂的对联：“同天并老，安富尊荣公府第；与国咸休，文章道德圣人家”。

族，这就是皇室贵族、国戚贵族和勋臣贵族。把这些贵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也都留下了很多材料。但是从一家一户贵族来看，材料就显得过于零碎、间接、不完整、简略或单一，有的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工作者只能集腋成裘地进行某一类贵族地主、某一个贵族地主集团或某一家贵族地主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而很难全面解剖他们当中的某一只麻雀。孔府档案的利用，打破了资料上的局限，给解剖孔府这只麻雀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解剖孔府这只麻雀，有几个重点。

孔府的政治方面，是孔府作为一个贵族大地主政权的活动。孔府政权、即孔府整套统治和管理系统的组成，它统治庙佃人户的方法和特点，庙佃人户对孔府的反抗，孔府与朝廷、地方官相互利用和矛盾斗争的状况，孔府与地方士绅的关系等等，是孔府政治方面问题的重要脉络。

孔府的经济方面，是孔府经济作为一个贵族大地主经济体系的性质、特征和各种表现。这是更加饶有兴味的问题。弄清楚孔府土地集中的历史和特点，租税剥削，自然经济的表现和作用，阶级结构，商业、高利贷和屯义集市行税剥削，寄生性消费，农业再生产等等，有助于全面说明封建后期生产方式的特点，它的运动规律。

根据孔府的特点，它的社会方面是同样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是族权统治和神权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宗法关系的表现是非常强烈的，而在孔府又尤其突出。孔氏宗族是一个非常严密、非常强固的宗族组织，所以孔府的族权统治是非常典型的。不仅如此，封

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引起另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就是孔子与诸“先圣先贤先儒”的师弟之间的宗法关系，在历史上结成了以孔府为首包括孔、颜、曾、孟、仲等等“先圣先贤先儒”各家宗族的体系。这种放大的宗法关系和宗族组织本身，提供了很多可供探索的重要课题。至于族权统治和政权统治的结合，就还是第二位的问题了。

因此，这种对一家一户贵族地主的研究，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狭小的阵地，但是，孔府的典型性和资料的丰富多采，决定这种研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广阔和深入的领域。

科学研究譬如登山。我们几个人作为登山者，深感力有未逮。何况孔府研究这样的一座山，前人登高者少，山路崎岖，我们不能企望达到任何可以自慰的高度。但是，攀登的欢乐深深地吸引和鼓舞着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勉力从山脚开始。

第一章 孔氏贵族大地主的形成 和贵族地主政权

第一节 孔氏世袭贵族大地主的形成

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阙里广志》一书，在序言中写了这样几句话：“夫帝王之姓有时无，定鼎之区有时无，独孔子之阙里则与天长存。”曲阜阙里，是孔子的故乡，他的许多子孙聚居在那里。所以，这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说明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和他的学说、以至他的家乡、他的子孙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二页）孔子的儒家学说完全是这样。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即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特别是他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更一直是地主阶级用以保障本阶级统治的最主要的精神武器；由儒家所阐发的礼乐

制度和典章制度，也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标榜和奉行。儒家学说代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构成两千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的牢固的思想基础。

孔子是春秋时鲁国人。他和他的门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与较晚出的墨家学派，成为当时最占优势的学派，而被并称为“孔墨显学”。战国时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学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墨仍属显学。后来，秦国商鞅变法，接着经过激烈的兼并战争而由秦始皇完成全国统一，秦朝重用刑吏，推行法术，孔、墨等各家学派都有削弱。特别是经过焚书坑儒，儒家更受打击。但是，秦朝统治者用横暴的方法并没有能消灭儒家和儒家思想。“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三页）“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七〇页）使儒家思想得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存在，儒家学派就不可能消失。

地主阶级重新发现和认识孔子、他的儒家学说，进而把这种学说定于一尊，推崇孔子，并泽及孔子后人，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秦朝灭亡，西汉统治者上台以后，十分重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在秦朝遭到压制的儒生也纷纷进言，宣传秦朝专任刑罚是覆亡的主要原因，要求用儒家的“行仁义，法先圣”巩固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当然能起这种作用。孔子的“正名”思想，就很适合地主阶级维护等级尊严的要求。儒家的“仁

政”说，也可以用来给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披上“仁慈”的外衣。儒家的“礼”同样为新的封建统治者所欣赏。儒者叔孙通定朝仪，使汉高祖刘邦非常满意。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由淮南返回京师，在经过鲁地时，“以太牢祀孔子”，（《汉书》卷一下，《高帝纪》）并下诏：“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孔府档案，编号〇〇〇〇〇〇六之一，以下只注明档案编号）以表示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重视。

然而，封建统治者把儒家学说完全抬高到地主阶级正统思想的地位，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的。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周秦以来的发展，到这个时候，已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长期存在的混乱、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上消除了，社会生产力也得到发展，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趋巩固；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因封建剥削、压迫的不断加重而逐步激化。这种新的社会动荡，使得封建统治阶级感到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一方面为它的封建大一统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又能构成其压迫、剥削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的理论依据，用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与之立功，”（《汉书》卷六，《武帝纪》）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地主阶级国家为了寻求自己的思想武器，毫不犹豫地采取政治手段，横暴地压制各种思想派别的活动，这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它不能不对其后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当然，西汉统治者推崇的儒学，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春秋时代的儒学。任何思想、文化都不能不随着历史的前进